

由一元到多元:从五四纪念对鲁迅的评价看鲁迅精神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郭 祥^{1,2}

(1.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2.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具有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鲁迅精神是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鲁迅精神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改变、话语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后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整合了鲁迅身上批判和建构、公共性和参与性的多种特质。新时代,应该从文明交流互鉴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弘扬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鲁迅精神;一元;多元;五四纪念

中图分类号:D64;I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10-11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2

From Unity to Plurality: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Lu Xun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n Him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May Fourth Movement Centered on *People's Daily*

GUO Xia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Lu Xun is a precious spiritual resour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spirit had different connot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represented the unity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became a unity encompassing various elements such as fighting spirit, scientific spirit, innovative spirit, and concern for the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pirit from unity to plurality is promp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PC,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the prevalence of various erroneous ideological trend after the reform and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21A0362);安庆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2022aqnuxzz03)

作者简介:郭祥(1980—),男,河南浚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opening up, and the need for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spirit by the CPC integrates various traits in Lu Xun, such as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public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and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pirit of Lu Xu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nd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Lu Xun; unity; plurality; commemoration of May Fourth Movement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从鲁迅和鲁迅精神中汲取力量,推动我国的革命与建设。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1]^[4]毛泽东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明确地称为“鲁迅精神”,要求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1]^[4]。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史中的特定概念,鲁迅精神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精神内核。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鲁迅既是真实的爱国者,又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2]。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江泽民指出,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是鲁迅一生走过的道路^[3]。2011年鲁迅诞辰13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指出,鲁迅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同志和亲密的战友,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勇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4]。2021年鲁迅诞辰14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指出,“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永远铭记着鲁迅先生的贡献和功绩,永远镌刻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坚守”^[5]。

作为中国共产党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鲁迅精神要为完成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因此,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释放其感召力和凝聚力。时代不同,鲁迅精神的具体内涵

亦不同。已有的鲁迅精神研究,大多与文学或文艺相关,少有揭示鲁迅精神与社会实践史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文重点参阅《人民日报》,基于中共概念史的视角,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中共五四纪念这一政治实践活动对鲁迅评价的差异,以揭示“鲁迅精神”这一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史”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存在实践史”之间的关系。

一、一元性: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破”看鲁迅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四纪念话语是一种革命话语,主要强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破”,即对传统文化的揭露和批判。此时,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

(一)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破”

早在1940年,周扬就曾称赞鲁迅的作品实现了“思想的要素和现实的要素”有机而高度的和谐,是彻底的现实主义^[6]。1949年,胡风高度评价了鲁迅的这种现实主义对于批判封建主义的意义,他将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称为“中国人民底第一声冲锋号”,并称其是“对于封建主义旧中国的血淋淋的战书”,“向封建主义旧中国表示了不能两立的决死的挑战态度”^[7]。1954年,周扬指出,《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封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战书,“它像烈火一样地烧毁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全部假面,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8]。他将鲁迅著作称作五四遗产中最光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号召大家研究鲁迅著作,继承“五四”的战斗传统,学习鲁迅“对于旧中国的极其深刻的解剖和鞭挞”,学习鲁迅“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切陈旧的、落后的事物的顽强战斗

精神”^[8]。周扬认为,鲁迅是在和封建复古派、改良主义派等文化战线上的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59年,黎澍和邵荃麟同样赞扬了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黎澍说:“鲁迅的许多精美的杂文深深地击中了旧社会的弊害,他到处鞭挞着各种落后现象,热情地呼唤着新生力量的成长。”^[9]邵荃麟称,鲁迅是“坚决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凶猛闯将,他的近三十篇小说“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他斗争的方向正是“党所要打击的方向”,他英勇地斗争,“实践了党在那时候的革命任务”,他最可宝贵的“硬骨头”性格“正是劳动人民的战斗性格”,他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并由“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所支持”。邵荃麟又总结说:“鲁迅是通过艺术实践来体现当时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的。在他那种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的战斗中间,有些看法是客观上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明了鲁迅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10]结合鲁迅知识分子的身份,这里所说的革命或斗争,主要指鲁迅对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鲁迅以此实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理想。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两个估计”的出笼,五四精神被异化为“打倒孔家店”,并将鲁迅推为“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当年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以后,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11]在“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中、在彻底反封建的社会声浪中,鲁迅彻底成为“反传统”的代名词,而“承传传统的鲁迅”却无人注意。

整体来讲,改革开放前,五四纪念话语对鲁迅的评价主要以其对旧文化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心。

(二) 改革开放前,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

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四纪念话语对鲁迅的评价相呼应,鲁迅精神是一种革命斗

争精神。

1951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5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的社论,指出,鲁迅不但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且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们从鲁迅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中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其中对于今天我国文化思想界的革命战士们最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的是什么呢?这就是鲁迅先生坚韧的思想斗争的精神”,要用鲁迅的这种精神,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批判,加强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12]。1952年鲁迅逝世16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以“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对于旧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黑暗、腐败、消极的一面,都加以无情的揭露与讽刺,使人民随时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另一面,鲁迅对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有一点真正代表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的主张和行动,就都极力赞扬,接受他们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打击各种各式的失败主义论,鼓舞人民的自信心,以推进新的革命斗争”^[13]。可见,鲁迅的爱国主义就是“斗争”和“支持斗争”。斗争精神是鲁迅爱国主义的现实表现和具体承担者。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鲁迅用他的文学创作战斗,也用其他一切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战斗。”^[2]社论要求广大人民最广泛地传播鲁迅的思想遗产,让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人们都用“鲁迅的斗争精神”将自己武装起来。此社论虽然提到了鲁迅的实事求是精神,但这一精神体现在他坚决揭发民族自大狂以及严肃反对浮夸、武断和宗派习气上,其主旨仍然是斗争。总体来说,鲁迅的斗争精神,其矛头所向主要是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借鲁迅精神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文革”期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鲁迅

的斗争精神被极“左”势力所利用,被简单阐释为“革命硬骨头精神”“造反精神”等,成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的工具。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于一身的鲁迅,却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批判家。改革开放后,“批判”在一般读者心中甚至成为鲁迅的“负资产”,应该与上述情况有关。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多侧重于鲁迅“革命家”的一面。这大致与三个因素有关:其一,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也就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其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虽然剥削阶级不存在了,但“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仍有残余;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意识”“革命话语”“革命经验”体现出强大的惯性,使得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技术革新等新中国建设的各领域都被冠以“革命”二字。当然,将鲁迅称为革命家其当之无愧。鲁迅曾明确指出,五四时期,他遵从“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投身文学革命^{[14]469}。冯雪峰回忆说:1927年到1936年,鲁迅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国民党,在此期间,“他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写得很多”^{[15]137}。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鲁迅进行革命的方式主要是文学创作。鲁迅向冯雪峰明确表示:“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些杂文,我比较顺手。”^{[15]144}鲁迅用手中的笔“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6],投身和参与革命。

二、多元性:从鲁迅的“以破为立”看鲁迅精神

改革开放后,五四纪念话语对鲁迅的总体评价是“以破为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为推动思想启蒙和建立新文化。

(一)鲁迅通过“解剖”传统和“拿来主义”推动思想启蒙和文化转型

鲁迅的文化批判激情和文化进取精神紧密相连。“改造这个千年古国陈旧了的文化体系,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摆脱精神的束缚,恢复活泼的青春,以自立于民族之林”^[17],是五四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历史

课题。因此,这一代知识分子把文化问题和民族命运紧密、深刻地联系起来,他们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扑面而来的文化批判激情和文化进取意识”。鲁迅的小说集也是如此,这源自鲁迅身上的文化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鲁迅对古老的儒家文化采取了“峻急的批判态度”和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接纳态度”。这种接纳态度表现在鲁迅积极提倡“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是一种闪烁着时代智慧的文学胆识,它既有‘胆’,胸襟坦荡,不因承认借鉴外来文学而脸红;它又有‘识’,眼光如炬,在借鉴过程中‘运用脑髓’去辨析菁芜。”^[17]这样,“拿来主义”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桥梁,也成为我国文学从古代文学跨越到现代文学的桥梁。架桥的人就是把对外开放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的鲁迅、茅盾等人,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自己回忆说,他写《狂人日记》“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14]526}。鲁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使中国文学获得了延续和新生。黄乔生举例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原文本,古今相接,从文言到白话;中外碰撞,进化的希望和循环的悲观纠缠不已。”^[18]

但鲁迅并非完全否定传统,而是以“分别好坏”的态度对待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等文学论著中,科学地评价了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扬了这种传统。”^[19]鲁迅喜欢墨子的思想、嵇康的散文、李贺的诗歌、宋末明季的野史,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像夜空中的星星点缀了不少民主性的精华^[17]。鲁迅明确表达过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破恶声论》中他指出,对自己民族的旧物一概否定是“竖子之见”,“虽一晒可靳之”^[20]。在《科学史教篇》中他指出,不能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往古人文”,更不能“得其差池,因生不满”和“晒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鄙陋”^[21]。在《习惯与改革》中他更明确指出,对于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

传统文化,必须改革,但改革需要“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14]229}。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2009 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李文海撰文指出:认为鲁迅“一笔抹杀、一概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无稽之谈^[22]。

那么,鲁迅何以要“打倒孔家店”呢?一方面要通过“反传统”推动思想启蒙;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再造”和“重构”。这两方面互为因果,紧密相连。1989 年汪澍白指出:“《新青年》派坚决反对封建传统文化,其目标是为了要在中国创建一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23]早在 1906 年留学日本时,鲁迅就将“启蒙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到五四时期,他更深入地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从‘立人’的角度反思传统”^[23]。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自己也说,他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去写小说,以改良人生、改良社会^{[14]526}。季言志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种文化转型,“在中国,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口号。他们一面‘只手打倒孔家店’,清算旧文化;一面高扬‘民主’与‘科学’,呼唤新文化;并试图以新文化去改造传统的国民性”^[24]。戴逸对这一点又进行了详细说明:“儒家的伦理精神年深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陈独秀、鲁迅等十分重视改造旧的国民性格。”^[25]鲁迅自己曾说:“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寄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26]鲁迅面对“铁屋子”呐喊,是为了摆脱“死人”,倡导新生,重塑民魂。“鲁迅对中国所说的尖刻的坏话,那是出于从内心里真正爱自己的国家”^[27];“他把旧社会的病痛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给社会起震惊作用,推动社会的变革”^[28]。

学界认为,鲁迅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于其“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他的小说名篇《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的创作成就,与他‘不忘本来’地研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等汲

取的创作营养密切相关”;“鲁迅在文学、美术领域里创作的显著实绩,也与他力倡‘美人之美’、介绍域外小说、研究世界版画并从中汲取创作营养密切相关”^[29]。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弃继承、古为今用,对外来文化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成就了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鲁迅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30]。

正是因为“以破为立”以及“本来”与“未来”的碰撞和融合,鲁迅才在批判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 年金冲及举例说,《狂人日记》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又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31]。鲁迅是借助文学这种工具批判旧社会、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的。“鲁迅文学实践中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是一种所谓文化的破坏,他不倦地往前行走,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构”;“鲁迅的价值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的改写,把‘立人’和国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设联系起来”^[32]。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是以建设新文化为落脚点的。

(二)改革开放后,鲁迅精神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

既然鲁迅在文化上“以破为立”,那么就潜藏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第二,如何建立新文化。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改革开放后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既包含坚韧的斗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包含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在这三种精神中,深嵌着鲁迅的为民情怀。

第一,鲁迅精神是坚韧的斗争精神。1981 年 9 月 25 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敢于斗争、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32]。1991 年江泽民指出,骨头最硬的鲁迅,主张韧的战斗,斗争最坚决^[3]。同是强调鲁迅的斗争精神,但改革开放前后其指向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强调鲁迅的斗争精神,主要是为了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改革

开放新时期,则在强调鲁迅敢于替弱势群体发声,敢于对假、丑、恶亮剑。江泽民指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克服腐败现象都需要鲁迅精神。2001年陈漱渝指出,鲁迅的恒常价值表现在“对假、恶、丑社会现象的绝不调和的批判态度”;同时指出,鲁迅的斗争精神,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反对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多欺寡^[33]。新时代,鲁迅的斗争精神主要指文艺和文学方面的批评和争鸣。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家就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34]。有人指出,鲁迅的文学批评,既“担当起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创造奋力闯开生路和通路的责任,从观念和舆论上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确立合法性、正当性”,又“从现实影响上对充塞、浸透了整个社会空间的旧文学和旧文化展开整理和批判”,“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光彩”^[30]。

第二,鲁迅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方面,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采取的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抨击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最善于鉴别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19]鲁迅虽然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和解剖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消极方面,但他同时看到,自己民族并不缺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2011年,刘云山指出,鲁迅“自觉地吸收借鉴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同时又反对食古不化、固步自封,与那些落后、陈腐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4]。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否定,而是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鲁迅之所以能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名篇,与他研究中国小说和唐宋传奇等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鲁迅从事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都保持着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并在晚年服膺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青年时期

的鲁迅立志学医,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和训练,有着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坚定的科学态度。周扬指出:“鲁迅在‘五四’前后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掌握分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由于他的坚定地探求社会人生真理的科学态度,因此,他的作品对中国社会的解剖仍然达到了异常深刻的水平。”^[19]1927年,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称其是“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认为这种科学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前进^[14]¹³⁰。“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他的科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也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19]孙郁指出:“鲁迅早期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后来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译介,形成了自己特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精神。”^[30]简单来讲,鲁迅的科学精神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学艺术规律的深刻认知和始终遵循上,而这来源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其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性战斗精神”,源自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3]。

第三,鲁迅精神是博采众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鲁迅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力主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提倡“拿来主义”^[3]。鲁迅主张博采众长,其目的在于文化创新。“鲁迅以博大的胸怀和气魄倡导的‘拿来主义’,在开放的条件下,不仅是衡量民族自信心的标志,也是建设先进文化、促进国家富强所必需的。”^[35]有学者具体指出:“鲁迅借助了外来小说的影响,现代新诗的成就有着更为鲜明的世界文学经验。”^[36]1927年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也是其“拿来主义”的表现。袁盛勇总结指出:“鲁迅早先倡导‘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后来高举‘拿来主义’,并且向往一种‘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汉唐气魄,这些无一处是引导人们去割裂中国文化的,反而是促使人发挥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顾,相生相

合,进而去创造一种属于新时代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化。”^[30]显然,鲁迅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博采众长的典范,也是融会贯通、锐意创新的楷模”^[4]。

第四,鲁迅精神是崇高的为民情怀。2014年10月,除要求文艺工作者继承鲁迅的拿来精神和“剜烂苹果”的批评精神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鲁迅的为民情怀。他指出:“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34]正如郭国昌所说:“鲁迅的创作一直是以广大民众为本位的,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将他们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不幸作为表现的对象。”^[37]可见,鲁迅把平民大众推到了文学领域的中心位置。2021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黄坤明指出,既要发扬鲁迅的爱国精神和战斗品格,又要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38]。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生都在为解放和改进国人的思想而奋斗……正是一代代像鲁迅先生这样向着理想信念而不断奋斗的民族脊梁,才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39]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同样指出:“无论是日本学医期间的‘幻灯片事件’,还是后来的弃医从文;无论是‘救救孩子’的呐喊,还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始终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彷徨,而呐喊。”^[30]因为鲁迅“批判的锋芒指向一切错误和落后的东西。就是对自己营垒的同志、同事,也毫不留情面”,所以有些人认为鲁迅“尖刻、无情”和“褊狭、好斗”,对此,有学者指出,不应该简单评判鲁迅的对错,应该深刻感受他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感^[40]。

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的“一元”和“多元”是相对而言的。改革开放之前,从五四纪念话语中可以看出,重在强调鲁迅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破”;改革开放之后,则强调鲁迅的“以破为立”。鲁迅精神也由一个支点“破”,变为两个支点即“破”与“立”。必须指出的是,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都是鲁迅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改革开放前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主脉和主线。

同样要看到,鲁迅精神中各个元素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鲁迅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区别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坏”,对“坏的”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好的”加以赞扬和继承。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有的放矢,“鲁迅的批判其所以最深刻有力,就因为它抓住了根本,就因为它科学”^[19];反过来讲,科学精神又要求必须坚持批判和斗争,“批判态度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41]。无论是斗争精神还是科学精神都以创新精神为旨归,创新精神则以斗争精神和科学精神为条件,而以上三者又都以鲁迅的为民情怀为动力和归宿。“鲁迅的文化观始终具有一种生命的热度和民族情怀,与其说他是从文化民主主义走向世界主义,毋宁说是用新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重构内心深处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让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人国’,而不至于从‘世界人’中被挤出。”^[30]鲁迅用现代人的清醒、思想家的理智、革命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激情,“系统地、缜密地、持续地‘研究’中国人,进行空前的彻底的民族反省,终生为民族及其子民们的自我更新而奋斗”^[30],获得了卓越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鲁迅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原因

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实践上说,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从“革命”到“发展”的重大转型。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与其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理论和话语的创新紧密相连。反之,鲁迅精神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牺牲、创造的一个窗口。

(一) 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改变

“中共纪念活动善于结合中心任务来开展,目的是服务现实,或从纪念对象中总结经验以指导现实,或借纪念活动表达对现实的主张,或借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整合,以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42]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改变,引爆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而且从本质上来讲,“改革”和“开放”本身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心工作。

改革需要破旧立新,开放要以我为主但也要博采众长。适应这一需要,鲁迅精神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1981年周扬指出,鲁迅主张改革,坚决抨击不肯革新的卫道士,“他呼吁青年不要唱千篇一律的八股老调子。他呼吁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创造出新的文学艺术”^[19]。1991年,江泽民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3]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鲁迅的名言——“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勉励新时代青年应承担民族振兴的时代责任^[43]。承担民族振兴的责任,离不开鲁迅的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应该勇克难关、勇斗风险;应该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应该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

更进一步讲,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转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4]36-40}。鲁迅作为“民族魂”,他的为民情怀和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是同一的。

(二)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从“革命话语”转变为“发展话语”。这深刻影响了五四阐释和五四纪念中对鲁迅的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五四纪念话语,总是强调五四运动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运动”。从“五四运动发起了中国的文化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运动”,再到十年“文革”期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核心话语都是“革命”。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和开端,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一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有力的推进者。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五四纪念话语,强调最多的就是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鲁迅的作品无疑树立了一个“不妥协,不退缩”地破坏旧世界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话语和首要目标,五四运动被看作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一个新起点”,其目标是“启蒙”“再造”而不是“破坏”。五四阐释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一种“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

在话语体系转型的背景下,鲁迅由一个旧文化的革命者转变为新文化的建设者;鲁迅精神由“破”这一个内核,逐渐发展为“破”与“立”两个内核,其中“立”是最重要的内核。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都是“立”这个内核的表现。有学者认为,这个“立”字有三重含义,即“立人”“立家”“立象”——“鲁迅在‘立人’(倡导现代人的充分自觉)、“立家”(眷顾个人、集体、国家乃至人类之家)和‘立象’(创造以文学、学术及书法等为代表的形象化、符号化世界)方面贡献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留下了丰富的深深地烙有鲁迅印记的文化遗产”^[30]。“三立”为“里”,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为“表”,辩证统一。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泛滥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阶层和价值观逐步多元化。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和影响了社会稳定。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科学精神成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同时,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克服腐败同样需要鲁迅精神。江泽民指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了搞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御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克服腐败现象的教育和斗争,仍然需要鲁迅精神。”“因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同鼓吹‘全盘西化’的卖国主义、宣扬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3]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外部表现和具体承担者。

同时,在价值观多元化和多种思潮激荡下,诋毁鲁迅和歪曲鲁迅精神的现象时有发生。“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鲁迅也受到严重的歪曲和贬损,出现了把鲁迅的前期和后期对立起来,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割裂开来,只承认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根本否定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只承认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否定作为革命家的鲁迅等错误观点。”^[45]2011年董学文指出:“历史、道德、文化虚无态度的肆虐,必然令有些人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对鲁迅的先前的认识规范加以无序化或特殊化。这样一来,鲁迅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价值认定,具有带动社会前行牵引力作用的精神坐标,也就愈来愈难以达成共识了。”^[46]因此,回归“本相”,回应现实,全面、客观评价鲁迅和阐释鲁迅精神成为现实需要。

(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域文明而进行文化

建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鲁迅都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文化建设方针的模范践行者。不过,改革开放前,在“革命”话语背景下,主要强调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改革开放后,在“发展”话语背景下,主要强调鲁迅对新文化的“立”。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文明之间应该坚持平等相待、美美与共、互学互鉴、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44]⁴⁶;要坚持“二为”“双百”和“双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44]⁴³。

在此背景下,鲁迅在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双创”方面的贡献得以被进一步挖掘。有人提出:“没了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映照,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不会‘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今天的一切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的故事。”^[47]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间点,“他继承传统但不画地为牢,面向世界而非丧失自我”^[47]。还有人说:“他(指鲁迅,笔者注)的文化自觉连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30]鲁迅是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双创”方针的模范践行者。鲁迅借助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对待其他文明和自身文明,达到

“立人”的目的,并愿“为中国在世界上争一个地位”,实现其为民情怀。

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话语”或“集体话语”,而“国家话语”或“集体话语”是与时代同行的。改革开放前,“革命”这一元叙事渗透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鲁迅精神被阐释为一元的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日益深入,“革命话语”逐渐转变为“发展话语”,那么它是如何转变的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而改革离不开开放、互鉴、创新,由此鲁迅精神也不再是一元的斗争精神,而是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整体。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前后,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定义鲁迅精神,均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只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改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的觉醒,在“革命”一元叙事背景下被无意遮蔽起来的東西又被重新“发现”了,从而为鲁迅精神赋予新的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后,鲁迅精神的不断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写照。

四、结语

“政治革命的推动是一种实践行为,革命理论的创建也是一种实践行为。”^[48]五四纪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是一种实践行为,而纪念总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而开展,其目的在于找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实现社会动员。时代不同,党的中心任务不同,五四阐释也就必然不同。五四纪念与时俱进,五四阐释某种意义上成为理论创建的实践行为。相对五四纪念而言,鲁迅精神的变化无疑是五四阐释这一实践行为的必然反映。五四纪念中对鲁迅评价的变化,无疑是鲁迅精神变化的实践基础;而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由一元变化到多元,说明改革开放是“鲁迅精神”这一概念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和关节点。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的所指发生明显变化,是转型期历史在观念世界的必然反映。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中心任务,丰富和拓展了鲁迅精神,涵养了自己的红色血脉。鲁迅精神应该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理由有四:其一,鲁迅被视为“不在党组织的共产党人”,是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其二,鲁迅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髓与实质是同一的,那就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历来重视用党外先进人物的精神资源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杰出人物的精神资源丰富、涵养和发展自身的精神谱系;其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鲁迅精神,挖掘其时代价值。

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始终强调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集体性和阶级性——鲁迅精神的主脉和主线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亦强调“启蒙鲁迅”和“介入知识分子鲁迅”——鲁迅怀抱以“立人”谋“救国”的为民精神,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用斗争(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直面“本来”和“外来”,“自美其美,美人之美”,实现了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整合了鲁迅身上批判和建构、公共性和参与性的多种特质。无论是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鲁迅的贡献始终是“立”——建设新文化。1940年,毛泽东说,鲁迅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当今,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国态度,“双创”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之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鲁迅精神仍然具有耀眼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作家 伟大的战士[N].人民日报,1956-10-19(1).
- [3] 江泽民.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在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N]. 人民日报, 1991-09-25(1).
- [4] 刘云山. 在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上的讲话[J]. 鲁迅研究月刊, 2011(9): 4-6.
- [5] 黄坤明. 在纪念鲁迅诞辰 14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1-09-3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317352057307067&wfr=spider&for=pc>.
- [6] 周扬. 周扬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27.
- [7] 胡风. 从源头到洪流: 纪念“五四”三十年[N]. 人民日报, 1949-05-04(5).
- [8] 周扬.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N]. 人民日报, 1954-05-04(3).
- [9] 黎澍. 论“五四”运动[N]. 人民日报, 1959-05-03(7).
- [10] 邵荃麟. “五四”文学的发展道路[N]. 人民日报, 1959-05-04(7).
- [11] 人民日报社论. 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N]. 人民日报, 1974-05-04(1).
- [12] 人民日报社论. 学习鲁迅, 坚持思想斗争[N]. 人民日报, 1951-10-19(1).
- [13] 人民日报社论. 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 纪念鲁迅逝世 16 周年[N]. 人民日报, 1952-10-19(1).
- [1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5] 冯雪峰. 冯雪峰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1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9.
- [17] 杨义. 飞架于文化沼泽的桥梁: “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化轨迹[N]. 人民日报, 1987-05-05(5).
- [18] 黄乔生. “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N]. 鲁迅研究月刊, 2018(9): 4-5.
- [19] 周扬. 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 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N]. 人民日报, 1981-09-28(2).
- [20]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32.
- [2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26.
- [22] 李文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N]. 人民日报, 2009-05-07(12).
- [23] 汪澍白. 中国文化的“再造”: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N]. 人民日报, 1989-04-14(6).
- [24] 季言志. 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N]. 人民日报, 1989-04-30(1).
- [25] 戴逸. 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N]. 人民日报, 1999-05-04(9).
- [2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32.
- [27] 徐怀谦. 回到鲁迅[N]. 人民日报, 2006-10-17(15).
- [28] 周扬. 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N]. 人民日报, 1980-02-27(5).
- [29] 仲呈祥. 融会贯通, 美美与共[N]. 人民日报, 2020-05-19(20).
- [30] 张江, 孙郁, 袁盛勇, 等. 鲁迅精神和我们的文学传统[N]. 人民日报, 2016-11-04(24).
- [31] 金冲及. 五四运动八十年祭[N]. 人民日报, 1999-04-20(9).
- [32] 人民日报社论. 鲁迅精神永在[N]. 人民日报, 1981-09-25(1).
- [33] 陈漱渝. 鲁迅的恒常价值[N]. 人民日报, 2001-09-25(12).
- [34]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10-15(2).
- [35] 仲言. 永远的鲁迅[N]. 人民日报, 1991-09-21(4).
- [36] 陈晓明. 批评的责任[N]. 人民日报, 2015-05-22(24).
- [37] 郭国昌. 鲁迅的当下意义[N]. 人民日报, 2013-10-22(14).
- [38]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1-09-27(4).
- [39] 甘冲. 奏响奋斗与幸福的二重奏[N]. 人民日报, 2018-05-03(7).
- [40] 梁君. 思考鲁迅[N]. 人民日报, 2011-11-09(24).

(下转第 34 页)

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能够收获如此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是因为传播主体很好地形塑了各种媒介工具并加以综合运用,开展了共产主义色彩的媒介动员活动。因此,今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注重媒介的运用技巧,以便充分发挥媒介作用,提高实效。

参考文献:

- [1] 韦尔伯·施拉姆.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 金燕宁, 蒋千红, 朱剑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134.
 - [2] 叶明睿, 陈桂川. 分担、共享与互促: 县级融媒体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媒介动员[J]. 现代出版, 2021(5): 56 - 61.
 - [3] HOVLAND C I, LUMSDAINE A A, SHEFFIELD F D. 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Vol. 3[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56.
 - [4]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5-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 [5] 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M]. 吴之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4.
 - [6] 王玉樑. 论理想、信念、信仰在价值观中的地位及其意义[N]. 光明日报, 2000-09-19(3).
 - [7] 王士立. 邓培传[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8] 李大钊.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M]//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436.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 1 卷[M]. 李季,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5.
 - [10] 段鹏. 传播学基础: 历史、框架与外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11] 谢欣. 意动叙述视角下党报的媒介动员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奋斗型“幸福”话语为考察对象[J]. 东南传播, 2023(1): 56 - 58.
 - [12] 黄鸿业. 大众媒介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J]. 新闻世界, 2011(4): 188 - 189.
 -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70.
 - [14] 王斌. 浅谈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及其对大众的影响[J]. 今传媒, 2019, 27(3): 50 - 53.
 - [15] 彭志翔. 从纸上到街头: 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30(5): 113 - 125.
 - [16] 王士立. 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创建的时间和早期的历史作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3(4): 3 - 7.
- (责任编辑: 李亚平)
-
- (上接第 20 页)
- [41] 刘大椿. 论科学精神[J]. 求是, 2019(9): 61 - 67.
 - [42] 陈金龙.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72.
 - [43]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5-01(1).
 - [4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45] 贺敬之. 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开幕词[N]. 人民日报, 1991-09-25(4).
 - [46] 董学文. 鲁迅精神的主脉与主线: 写在先生诞辰 130 周年之际[J]. 高校理论战线, 2011(9): 69 - 71.
 - [47] 任姗姗. 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N]. 人民日报, 2016-08-30(24).
 - [48] 郭若平. 时间限度: 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艺认知[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11): 39 - 53.
- (责任编辑: 李秀荣)